

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 理论讨论会文稿选编



中共贵州省委 宣传部 研究室 编印

Z121-53

4

前　　言

为适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交流改革的经验体会，现将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的文稿选编成册，供有关部门、单位的同志们参考。

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于1984年12月5日至8日举行，就加快我市城市改革步伐的问题，围绕着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重点讨论了搞活企业，搞活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问题。这次讨论会收到了征集的理论讨论文稿82篇。各界同志踊跃撰写理论文稿，反映了理论战线思想的活跃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深入人心。与会同志总结交流了前段改革的经验，就《决定》阐明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加深了对《决定》精神的理解，深化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认识，有益于对我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补充、完善和贯彻执行。

这个集子系内部刊物。由于篇幅的限制，所收集的只是选编稿。在编印过程中得到省、市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谨致谢忱。

由于编印的时间紧迫，并限于水平，书中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教正。

编　　者

1985年1月

目 录

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在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讨论会上的讲话	(1)
市委书记夏页文同志在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讨论会上的讲话	(21)
丁廷模同志在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上 的总结讲话	(26)
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 ——贵阳市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综述 (章澎、孙吉平整理)	(35)
试析增强企业活力(蒋应铨)	(48)
企业要围绕增强活力进行内部配套改革(熊士其)	(59)
推行和完善经济责任制，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 (贵阳电线厂)	(66)
试论两级分配(贵阳市劳动局)	(71)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几点认识(韦平、金家源)	(76)
企业富余劳动力出路雏议(贵阳市劳动局)	(85)
议简政放权(陈裕国)	(91)
改组联合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景诗鼎)	(98)
对贵阳市部分工业公司的调查(张忆)	(109)

-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对国营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
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探索(包海桥)………(118)
建立适应我市生产力状况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
方式(肖燕龙) ………………(124)
浅谈我市小型国有企业的“集体经营”(罗明、
熊文武) ………………(136)
振兴建筑业 为四化服务
——试论建筑业经济体制改革(秦伯明)………(146)
运用价格杠杆搞活经济(《贵阳物价工作研究》
编辑室) ………………(153)
关于建立“贸易中心”之浅见(廖克明、朱可风)………(160)
谈建立我市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贸易中心网络
结构(贵阳市商业经济学会秘书处) ………………(167)
发挥金融中心作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郭以中、
熊尔璧) ………………(172)
人才工作者的任务(高广瑞、张朝湘) ………………(178)
发挥智力优势，建立科研中心(贵阳市科委) ………………(185)

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在我市经济

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知道同志们在市委组织下召开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会议提出的问题、探讨的问题以及探讨的态度，使我们很受教益。希望我们在这次理论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领会、消化中央这个《决定》的精神。这个《决定》，正象耀邦同志和紫阳同志讲的，它不是对于当前工作的某些部署，而是关于我们整个国家通过改革将要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和蓝图。这个《决定》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一篇新的政治经济学。要深入、完整地领会《决定》精神，弄清楚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通过改革将要形成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个什么样子，以便摆脱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很好地贯彻这个《决定》，来建立一个能为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能促进商品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大发展的经济体制。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约一万六、七千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以来，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总结当中，提出了加速以城市为重点的、整

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是从这里提出来的。整个《决定》，把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全部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或者目标提出来，阐述了整个改革要抓住的中心环节，提出了衡量我们的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志，并且围绕着形成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这样一个主题，就计划体制问题，就所有制和经营形式问题，就价格体系的改革问题，就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问题，就国家的经济职能和这样的职能如何恰当地、正确地加以发挥，以及在这样一个改革当中怎样来加强党的领导，都作了比较全面、完整的阐述。

你们这次讨论会，抓住了搞活企业和发挥城市中心作用这么两个问题，就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就政权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责及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展开了讨论，这对于正确领会和全面贯彻整个决定的精神是很必要的。

我这里试图讲一下，为了使决定的各方面具体规定得以贯彻执行，除各方面的问题外，还要对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整个的经济体制模式从整体上来研究一下它的特征；反过来讲，要从整体上来探讨一下它的形成认识论的根据。这也就是说，怎么来从整体上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从基础上来弄清楚它的根据。我想在总体上提几个问题来思考一下，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是商品经济出现的原因、根据是一条还是两条？在我们理论界相当长一段时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经济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出现，仅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相联系；再确切一点讲，仅仅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联系。因此，他们把私有制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看成是不存在商

品生产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消灭以后所出现的新的更高层次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同样看成不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的。这个观点我历来不赞成。一九六〇年，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一次经济调整时期。当时党内发了几本书，一本叫《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本叫《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作为它的附册；还有一本，叫做《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理论的简述》。当时我们就研究这个问题：商品和商品经济的出现，是不是仅仅跟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者说仅仅跟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看来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人们的经济生活，把这个完整的运动着的经济体制区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把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区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是个划时代的理论创造！它对于使我们从社会生活的迷雾里进而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现象的出现，就不能简单地仅仅用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解释。应该看到，商品经济是在两个因素下出现的。一个，或者说基础的一个，是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出现，分工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假如看不到这一面，那就会导致一个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就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或者改造，等同于商品经济的消逝。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看，是不对头的。从实践上已经看见，它导致了多么严重的恶果！只要社会有分工存在，就有不同的生产者交换他们劳动、交换他们产品的必要性。我记得中学时代看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说棺材店的老板所生产的棺材就是商品，因为棺材店的老板做棺材，不是为了装自己用的，而是为了交换。社会主义的经济

是一种什么经济？大家一致感觉到中央的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非常正确。这个论点写到正式决定里，作这样明确的表述，恐怕还是第一次。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讲到发展商品经济，可没有这样明确阐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我觉得要理解中央这个决定或者说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央这个决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找出若干问题。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上认识的片面性，很可能是导致我们长时间产生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在里面翻跟斗，死人，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很可能与这有重要关系。我觉得探讨一下整个《决定》，进而深化我们的认识，商品经济怎么跟社会主义连到一堆来了，怎么跟计划、怎么跟公有制连到一堆来了，是很有益处的。反过头来，把我们原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对商品的理解、阐述等等，作一些对照，再反复作点研究，看行不行。认为商品经济的出现仅仅跟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从根本上讲，我是怀疑的。我感到商品经济的出现，首先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如果不把这个当作基础，当作决定性的东西，那就说不清一切问题，那现在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消灭私有制、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二十八年了，对我们这个土地上的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现在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问题来，就不大好理解了。这是我感到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关于计划或者叫做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对这个问题，理论界长期流行着一个观点，认为计划化是公有制的属性，或者说是它的要求，是公有制建立以后，社会的生产所必然要遵循的规律。这个看法对不对？我抱怀

疑态度。我讲的两了问题都是翻案文章，就是翻自己思想上的案。现在来看这个问题，有计划，另一种表述叫按比例，有些经济学家不赞同把这两个问题等同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这个要求从哪里来的？我感到仍然有两个方面的根源。没有公有制的建立，就无法实现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行。有计划，或者说按比例协调发展，首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提出来的。没有社会化大生产，就谈不到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要求。经济生活本身提不出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要求来。这本身首先是生产力发展，分工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这个要求无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还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它都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向前发展的。由于私有制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必然性在经济生活中的实现加以种种阻拦，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周期性的、大的经济震荡，这就是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反映着按比例的协调发展是大生产本身的一种必然性，是它的客观要求，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危机、有震荡，证明不存在这个客观要求；恰恰这个震荡证明了，这个客观必然性在那里不顾一切为它的实现开辟道路。我说这点有啥想法呢？就是要我们反过来看一个事实：虽然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但我们仍是较落后、闭塞的经济条件，广大农村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上没有计划化的需要，也没有计划化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你一定要去进行计划化，那是多此一举。因为没有这个客观要求。在大山沟里边各人种红苕，管自己吃饭；各人喂自己的猪，管自己的吃肉，你去搞什么计划化？你谈

不到计划化问题。翻过头来，一定要在中央、中心形成一个计划来自上而下地管下去的结果，只能造成生产上的混乱。不仅达不到要求，生产得不到发展，而且要造成破坏。我觉得这是在学习《决定》中需要进一步深化，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然经济比重很大、很闭塞的条件下，在相当大范围内还存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去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分工的发展，促使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巩固的、同社会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基础，才有可能去有计划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如果不去做这个工作，后边的问题就谈不到。

第三点，前面这两个前提，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题，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如果看法是对的，那么，下面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社会经济系统？怎么来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本性？并且按照它的本性来建立符合其本性的调节系统，选择符合这种本性的调节方法，建立符合这种本性的调节体制。计划体制问题是当作《决定》的核心问题提出来的。我们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涉及到计划体制问题。

《决定》的第四条的题目，就叫“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的计划体制，只能是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制，只能是粗线条的、有弹性的，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国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协调发展。这是整个《决定》里面很重要的一部份，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贯穿

全体的东西，是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构架的一根主线。这一段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触及了整个《决定》的基础。所谓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谓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首先就同这个问题联系着。所以，我建议同志们把《决定》的第四条反复认真地研究一下。通过研究，有可能使我们把整个《决定》要建立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的蓝图搞清楚，对这个模式可以大体上有一个轮廓。《决定》在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时，讲到了体制存在的弊端。这弊端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死”，缺乏活力。

“死”的对立面是“活”。整个《决定》就是把经济搞活的《决定》。《决定》里许多地方提到，要把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搞活，要使整个体制充满活力，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要使企业活起来。这就牵涉到一串子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为什么会搞死？认识的根源在哪里？是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上的失误造成的呢？

如果不先讲理由而先下结论的话，我认为我们过去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搞得很死，从它的认识论的根源上讲，是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造成的。我们怎么扣这顶帽子的呢？我想翻过来说一下这个意思。过去，我们对社会经济系统有个很著名的比喻，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比作一部大机器，把它的每一个局部比作为这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比喻在很大的范围内，在很长的时期内流行着，反映和代表着我们对社会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一个本质的认识。当然，任何比喻都只能在相似的意义上去理解，不能认为比做机器就是机械唯物主义。但是，这个比喻却较深地打上了一种烙印。社会经济系统从本质上说，究竟

是一架大机器，还是一个有机体？这是两个比喻，哪个更象一点？如果从整体上把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比喻为一个大机器，那么，我们就把它的各个局部看成是一些螺丝钉、一些部件。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把社会经济系统的本质比喻为一个分层次、有结构、复杂但又是有序的有机体，那么，我们就会把它的各个局部相应地看作细胞，看作由细胞组织起来的组织，看作若干组织形成的器官。假如把社会经济系统看作一部大机器，把它的局部看作这部机器的若干部件和螺丝钉，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之间的相互连结看作是一种钢性连结的东西，看作是类似一部大机器，通过它的发动机、通过链条和齿轮带动各个部件，机械地按比例同步运转的这么一种活动。就把社会经济系统看作这么一种连结和活动。反过来，假如我们从整体上把社会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机体，把它的各个局部看作是细胞，看作是由细胞组成的组织和器官，那么，对于它的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连结，我们就会看成是一种柔性连结的，一种比较复杂的柔性连结的，是一种通过它的各种管网，包括神经、血液和其他的网络，进行反馈调节的，兴奋和抑制相交替的，一种自适应的这样一种连结。如果把它视为一部大机器，把它的局部视为一些齿轮、螺丝钉和部件，那么，这些局部的更替，就是通过磨损、通过调换的办法进行更新。如果是一个有机体，把它的局部视为一些细胞、组织和器官，那么，它在运动过程中就是通过新陈代谢，通过自组织、自增殖、自适应不断地取得新生。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究竟怎么来观察它，是不是可以作这么一点思考？

我们在很长时期把整个国民经济看作是一部大机器。这

部机器是一个单发动机的。单发动机在社会中心，在国家最高层。中心发动机一运转，取得动力，通过各种单线连结的传动方式，把一切都套在里面，然后大家同步按一定比例运转就完了。什么叫计划性强？通通套在里面来跟着转，就叫计划性强。哪个地方没有套进来，哪个地方的计划性就叫不强。就要去追求一个由社会中心直接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这么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每一个局部，没有它的自主能力，也不需要它进行任何的自主活动，只要把它套在这个单发动机的大机器里边跟着转就行了。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我觉得是比较接近于这样一种认识的。而现在来看这个认识、这个类比，好象是不怎么合适了。

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它是分层次、有结构、纷繁复杂但又是有序的。它的内部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一个简单的同步运转关系。它的每一个局部都要有自组织、自适应，自我增殖、新陈代谢的能力。它的各个层次之间是分层次来进行调节的。它的调节方式不是机械上面的链条和齿轮的调节方式，而是其它的有机调节式。很多地方是通过反馈调节来实现的。它是连结是一种柔性连结。《决定》上的写法叫弹性的，用了“有弹性的”这么一个词。它是一个柔性连结的东西，这里有极大的活动余地，而且随着它的各个局部的变化，譬如说生产发展过程当中，技术的变化。它可以形成若干不同的结构，至于这些经济结构中每一个固定的模式，哪一个占百分之几十，天下没有这么一个东西。过去我们曾经追求这个东西。什么叫工业化的成功？工业总产值占到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大概就叫工业化成功了。我们过去不是在探讨这个问题吗？

也不能说这样的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现在也很难讲这样的研究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为了共同来探讨《决定》的第四节，即“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列宁在制定电气化计划时讲，“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再追求这样的空想了！从列宁的时代来讲，有这样的认识水平，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列宁很注意观察实践，他原来的设想，也是跟某些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一样，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公有制建立以后，就会有完整的、包罗一切的计划。但是，他在俄国的环境下碰到了这个问题，证明了“完整的、包罗一切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得出了这个结论。列宁说的这个话到现在已有六十年了。我们现在翻过来进一步看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的俄国办不到，不仅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办不到，而且从社会经济系统的本性来讲，不应该那样去追求。不应该追求由社会中心来搞一个包罗一切的计划。而要按照它的本性建立适应本性的调节体制。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粗线条是相对于细线条来讲的。假如我们把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视作一个分层次，有结构，有序的这么一个有机体，那么，我们全国的计划，对于各个局部来讲，只能是粗线条的，不能搞细线条；必然是有弹性的，而不能搞钢性计划。就是把各个企业、各个方面通通用齿轮，用链条把它咬起，那就不得了。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柔性连结的东西，一定要具有弹性。只能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而不能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用钢性的强制的办法。脚踏车的连结，脚踩

的那个轴到后边的轮轴的连结，就是一种钢性的连结。两个大小不同的齿轮、中间用链条连起，前面一脚踩下去，后面非跟着转不可，否则会把链条崩断。要么前后跟着一起转，要么根本带不动。经济系统调节不一样，它是通过计划来进行平衡，是用经济手段去进行调节，是一种间接的调节方式。比如说，要增加棉花的产量，不是直接给农民下命令每家应种多少棉花，而是运用价格等经济杠杆去进行调节，杠杆一下子就把它撬起来了，撬起一亿多万斤棉花来了，现在八千五百万斤就够了。搞这么多不得了，目前则要反调节，杠杆要拿办法使它降下来。总的要求是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目的是保证重大比例关系比较适应；国民经济大体上按比例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是个有机体，每个局部的细胞都是活生生的，有自适应的能力，自我调节的能力，具有自组织能力，可以新陈代谢，可以自己获得新生。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是一种主动的相互联结的关系，就整个有机体、神经中枢来讲，它只能通过一致、兴奋，通过各种激素，通过神经网络去影响它的运动状态，而不是简单的通通套在齿轮上、链条上，按照一个指挥棒在那里转圈，没那回事。所以我们将要形成的整个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不应该从整体上作一点思考？要把它想清楚。不想清楚，事情相当难办！有些同志担心得不得了：企业搞活了怎么得了！脚踏车上的后轮要活了还得（当然，不能活的那个东西，活不得）！只能随着我的链条，完全按我的同步运转，一比三、一比五，它总是有个比例的。这个比例倒可以调节，但是我一脚踩下去你就得转。实际上社会经济系统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是这样一种关系。贵烟一厂、

二厂，两个厂自己在哪里自我繁殖、自我发展，整它个五十万箱香烟，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大乱？没有大乱。还满不错！一点没有大乱，对贵阳市的经济还搞活了一点。所以这里的好多问题，是可以研究的。我总感到要从总体上作些思考。过去的那种观念，我觉得它的思想认识论的根源，比较象是一个机械唯物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即把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有机的这样一个系统，看作是一个无机的、比较机械的东西。恩格斯和马克思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社会是啥样子。他们从不离开实践来研究，他们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研究资本主义过程中，找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估计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实践。列宁有了这方面的实践，他在“十月革命”后，虽然六、七年时间就去世，但他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他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还来不及沿着这条路去对整个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系统的探讨。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既有功又有过。所谓有功，就是亲自领导了这么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胜利，并且在他的晚年，即去世前几年的时间，作出了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商品生产这样的概念，承认了这一点。毛主席讲他的承认是“羞羞答答的”；是羞羞答答的！你现在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拿出来看，他就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他就说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就不存在什么调节作用。怎么没有调节作用？现在清清楚楚的天天看到调节作用。要没有那个调节作用，现在就没有那么多钢材。我不是讲转手倒卖，把国家的钢材拿来放在我的腰包里，然后去敲

竹杠，我不是讲这个。这个要反对。这以后要定纪律、定法律。但是国家规定，原材料工厂，比如象煤矿、钢厂、铝厂，在超计划的情况下，可以协商议价出售。最近，国务院又批准我们全省的木材，一年几十万立方的木材，国家指令性调拨计划，一律按照国家价格规定的全部给我们免掉了。国务院这个通知就是，让你这个地区根据你有多少木材积储量，来确定合理的砍伐数量，而且不给你规定指令性的计划调拨你多少木材，让你在合理的砍伐限度以下，通过协商议价的办法，可以卖更高的价钱。没有这样的调节怎么行？斯大林是没有承认这个东西的。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翻去复来的话，你要把主席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论述按照年代排起来看，他一下子翻过去、一下子过来。我刚才讲1961年，我们在学那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研究那一段理论的时候，就是把主席的好多批示都发表了。上面讲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如果不学会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今天这样讲的，主席说到什么程度了？另一个批示就讲到，刮共产风的东西原来主席批过，一般不算旧帐。但这句话说错了，要改为一般要算旧帐，要退赔。但后来，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再加上有一些人的有意歪曲，到“文化革命”搞不清是个什么东西。另外就是那个“五·七”指示，你看，“五·七”指示讲的究竟是个啥？要学工、要学农、要学军，说军队农场里面也可以搞一点生产，也可以给国家进行交换。你把主席后期的东西拼在一起，一条条的全部连起来，你看象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主席在我们这个客观生活面前，在他的中期，甚至到后期的一部分时间，他对社会生活的脉搏还能够感应得到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主席作出